

[Special Contributions]

The Road to Nobel Prize and the Diaspora Classification of African Writers

ZHU Zhenwu HUANG Lingya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April 11, 2022

Accepted: May 6, 2022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ZHU Zhenwu & HUANG Lingya. (2022). The Road to Nobel Prize and the Diaspora Classification of African Writer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3), 001–00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01.p](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01.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01.p>

The present paper is one of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key project entitled “History of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No. 19ZDA296)” supported and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Tanzanian writer Abdulrazak Gurnah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21, many people thought it was another “surprise” of the Nobel Prize, but that is not the case. The Prize has a history of 120 years and has so far been awarded to 118 writers, seven of whom are African writers. The proportion is not high indeed, but it is undoubtedly higher than that in Asia, South America, Australia and some other regions. A careful study of the works of African writers will enable us to perceive the open and broad cultural vision and the inclusive and tolerant humanistic spirit, and to capture the uniqu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regional elements in their works. An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iterature of other regions, diaspora syndrome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Local diaspora, foreign diaspora and colonial diaspora, so to speak, constitute both the main features of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three types of Nobel Prize writers. Gurnah’s reception of the award once again proves that the richness, inclusiveness and foresight of African literature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iversity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real emergence of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African literatur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three diaspora literature theory; diversity of world literatur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Dr. ZHU Zhenwu is a level-two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NU). He is currently the head of the Key National Disciplin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director of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of SHNU, and his research cover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tc. HUANG Lingya is a master’s student of the Key National Disciplin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nd he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非洲作家的諾獎之路和流散類分

朱振武 黃鈴雅

上海師範大學

摘要：2021年坦尚尼亞作家古爾納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許多人認為這是諾獎的又一次「爆冷」，但事實並非如此。諾貝爾文學獎已經有120年歷史，獲獎者共計118位，其中非洲作家共七人，占比雖然很低，但還是高於亞洲、南美和澳洲等地區。仔細研讀非洲作家的作品，我們可以感受到作品中開放、廣闊的文化視野和包容、隱忍的人文精神，以及獨特的美學表徵、文化蘊涵、區域元素特別是流散症候。可以說，本土流散、異邦流散和殖民流散共同構成了非洲文學的主要表徵，也構成了諾獎作家的三大類型。古爾納的獲獎再一次證明，非洲文學的豐富性、包容性和前瞻性對世界文學多樣性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非洲文學；諾貝爾文學獎；三大流散；世界文學多樣性

基金專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非洲英語文學史」（專案編號：19ZDA296）

引言

2021年10月7日，坦尚尼亞小說家阿卜杜勒拉紮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 1948-）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鑒於他對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對文化與大陸之間的鴻溝中難民的命運的毫不妥協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①。在得知古爾納獲獎消息後，非洲文學界一片歡騰，100多位作家紛紛向古爾納送上祝賀。作為1986年的諾獎得主、第一個獲得諾獎的非洲本土作家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評論說：「諾貝爾獎回家了」^②。非洲文學屬於「非主流」文學^③，看似不顯山不露水，實則在沉默中爆發出了蓬勃的力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歷來多集中在歐美國家，且以英語作家居多，這無疑使大眾質疑起其初衷和權威，而索因卡說的「諾貝爾獎回家了」，正是指諾貝爾獎正視了非洲這塊廣袤大陸上的文人墨客，開始檢視和思考非洲文學的特有魅力和特殊價值。

「真正的文學多樣性被所謂的西方主流文化或者說是強勢文化壓制和遮蔽了。因此，許多非西方文化無法進入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關注視野。」^④非洲文學的遭遇在這一點上與中國文學的遭遇頗為相似。試想，沒有占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國文學和占全球陸地面積五分之一人口超過13億的非洲文學的參與，世界文學怎麼可能具有世界性？而作為「非主流」文學的非洲文學，其最本質的特徵就是流散。在殖民歷史文化各種因素的交織影響下，非洲文學逐漸表現出身份認同、邊緣化處境、種族歧視、性別壓迫和家園找尋等鮮明的流症候征。這一點在非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七個作家的創作中表現得更加明顯。非洲的七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依次是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 1913-1960）、奈及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 1911-2006）、南非作家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1923-2014）、南非作家J. M. 庫切（J. M. Coetzee, 1940-）、桃莉絲·萊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和剛剛獲獎的古爾納，分別於1957、1986、1988、1991、2003、2007和2021年獲獎。非洲作家總體來說可分為三大類，即本土流散作家、異邦流散作家和殖民流散作家^⑤，而這七位諾獎得主正是這三類非洲作家的傑出代表。

一、索因卡和馬哈福茲：本土流散中的諾獎得主

那些身處自己的國家，但因文化失根、語言被同化、心靈處於流浪狀態，卻未曾遷徙他國的作家就是本土流散作家。1986年和1988年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奈及利亞的索因卡和埃及的馬哈福茲就是這類。本土流散作家並未產生地理位置上的徙移，直接面對的是異質文化的侵襲而造成的精神流散，這種流散在他們的創作中主要表現為其對待異邦文化的態度和處理方法。

當瑞典文學院將198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沃萊·索因卡時，其意義遠不止是表彰一位抒寫了黑人理想的文學巨人，更在某種程度上說明非洲文學引起了關注，逐漸進入了大眾視野。索因卡因「廣博的文化視野創作了富有詩意的關於人生的戲劇」^⑥而獲獎。1934年，索因卡出生在奈及利亞西部阿貝奧庫塔約魯巴族一個督學的家庭，1952至1954年就讀於伊巴丹大學（University of Ibadan），畢業後前往英國里茲大學研讀文學，同時開始計畫出版一部名為《凱菲的生日凶兆》（*Keffi's Birthday Threat*, 1954）的短篇廣播劇，在英國學習工作了近六年後返回祖國。索因卡長期參與奈及利亞政治，大膽直言，以文字為武器針砭時弊，雖因此飽受迫害，但也贏得了聲譽。

身為本土流散作家，民族自豪感以及約魯巴傳統文化認同問題是索因卡作品關注的重心。《雄獅與寶石》（*The Lion and the Jewel*, 1959）講述了非洲部落之間的衝突，描述了一個黑人青年面對來自西方世界的壓力而產生的焦慮感和孤獨感。在《巴阿布國王》（*King Baabu*, 1983）、《巨人們》（*A Play of Giants*, 1981）和《未來學家安魂曲》（*Requiem for a Futurologist*, 1983）等作品中，索因卡著重關注後殖民時代非洲新生獨立國家獨裁政府的種種惡行，探討殖民創傷，對本民族歷史傳統進行反思與重構，以喚醒非洲人的文化認同感。索因卡創作的主要題材是約魯巴文化中的神秘意象和神話傳說，但吸收融合了現代派文學等西方文學思潮。正是本土文化與異質文化的交流碰撞造就了他。《森林之舞》（*A Dance of the Forests*, 1960）創造了譬如「烏龜夫人」等具有隱晦象徵含義的半神形象，將叢林中的人神聚會和慶祝儀式化為1960年奈及利亞獨立大會的縮影，達到歷史與現實一體化的效果。《癡心與濁水》（*The Interpreters*, 1965）更是與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絲的《尤利西斯》（*Ulysses*, 1922）有異曲同工之妙，具有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特徵。

索因卡在作品中展示的是一個與異邦文化融合的國度，而不是被異邦文化所奴役的非洲，從中能看出其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面對異邦文化，索因卡選擇樹立約魯巴人的文化尊嚴，以包容的姿態吸收外來文化中的積極元素，促進異邦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融合。「索因卡的成功再次表明：立足于民族傳統文化，同時具有開放的、廣闊的文化視野，乃是當代世界各民族文學發展的大方向。」^⑦沒錯，要有開放的、廣闊的文化視野，同時還要有包容的、隱忍的人文精神。這是自索因卡、馬哈福茲以及其他非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共同之處，也是非洲文學的共有特點。

繼索因卡後，198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埃及的馬哈福茲折桂。馬哈福茲「通過大量刻畫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現實主義，喚起人們樹立雄心，形成了全人類所欣賞的阿拉伯語言藝術」^⑧。馬哈福茲在1930年完成中等教育後，進入開羅大學學習哲學。1936年，他決定暫停學業，當職業作家，並於193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命運的嘲弄》（*Fate Mess*, 1939）。《命運的嘲弄》通過回顧埃及古老而輝煌的文化，強調了埃及人的民族認同感。此後，馬哈福茲的創作更加轉向現實關懷。在《海市蜃樓》（*The Mirage*, 1948）之後，馬哈福茲憑藉「開羅三部曲」——《宮間街》（*Palace Walk*, 1956）、《甘露街》（*Sugar Street*, 1956）和《思宮街》（*Palace of Desire*, 1956）——成為埃及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也因此獲得了埃及國家文學獎（Egyptian National Literature Award）^⑨。馬哈福茲是土生土長的埃及人，屬於本土流散作家，從創作之始到封筆之作，無一不講述著埃及故事和阿拉伯文化。



馬哈福茲的作品「是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及本民族傳統文學融會在一起,共同孕育的產物。因此,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最能體現現當代文學的風采」^⑩。在著名的「開羅三部曲」中,馬哈福茲描述了埃及商人家族三代人的命運,以及埃及社會在 20 世紀上半葉與西方接觸的歷程和現代化過程中的變化。故事以引人入勝的情節、樸實幽默的風格以及非凡的洞察力吸引著讀者,反映了 1917 年至 1944 年埃及的社會動盪。作品以小見大,通過一個穆斯林家庭的故事影射了一幅現代埃及的風俗畫卷,以鋒利的筆觸批判了舊社會的陋習。《續一千零一夜》(*Morning and Evening Talk*, 1945) 則以魔幻的筆法將十三個關於死亡、欲望和人性的故事娓娓道來,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埃及社會諸如黑暗和暴力的問題,充滿政治寓言色彩,記錄了馬哈福茲在中東戰爭失敗後對薩達特執政時期的種種弊端所進行的反思。《我們街區的孩子們》(*Children of the Alley*, 1959) 運用獨特的象徵手法和空間敘事來敘述傑巴拉維街區幾代人的救世故事,以此象徵人類歷史的進程。《海市蜃樓》是馬哈福茲另一部明顯運用了西方敘事藝術而寫成的小說,具有顯著的心理分析特徵,通過帶有悲愴色彩的敘事展示現實世界的不可靠性。

「由於殖民者推廣殖民語言、傳播基督教、侵吞土地、實行種族隔離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非洲原住民在自己的國土上被迫進入一種『流散』的文化語境。」^⑪。許多非洲作家並沒有經歷空間上的位移,但仍然呈現出一種心理上、精神上的無所適從,成為本土流散者。面對這種困境,索因卡和馬哈福茲這兩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本土流散作家作出的選擇都是積極面對,反對固步自封。殖民主義對非洲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控制不但沒有削弱非洲本土的語言文化特色,反而使作家的作品呈現出鮮明的流散表徵的同時彰顯出強烈的民族色彩和鮮明的民族特性。

二、加繆、戈迪默、庫切和萊辛：殖民流散中的諾獎得主

在遭到殖民入侵後,非洲大陸上逐漸積聚出一種特殊的流散群體——「殖民流散」群體。「『殖民流散』特指前往非洲的殖民者或具有殖民性質的群體及其後代,由於其殖民書寫於殖民地瓦解之後對帝國往昔的複雜情結而表現出與第三世界的流散相似又相異的文化和心理。」^⑫。在非洲,「殖民流散」主要是指白人移民及其後裔,加繆、戈迪默、庫切和萊辛是殖民流散作家的代表。殖民流散作家的創作與非洲本土作家的創作存在差異,顯露出與之不同的價值認同和審美差異,但其無根漂泊之感得卻與本土流散作家非常相似。

非洲大陸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是法籍埃及作家阿爾貝·加繆。1957 年加繆因「他的重要文學作品透徹認真地闡明了當代人的良心所面臨的問題」^⑬而問鼎諾獎。這位殖民流散作家出生于非洲北部的阿爾及利亞,父母都是法國人。

阿爾貝·加繆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Mondovi),父母都是法國人。1914 年,加繆剛剛一歲,父親就在馬恩河戰場上飲彈而亡,這使加繆的童年充滿艱辛。母親不得不加繆移居阿爾及爾貧民區外祖母家,靠做傭人勉強維持生計,後來連小學都上不起。早年的艱苦生活使得加繆對非洲人民在殖民高壓下的生存境況產生深深的同情,難怪其多部作品的故事背景都在阿爾及利亞。兒時的加繆連小學都差點中斷,幸虧一個名叫路易·熱爾曼的老師發現了他的天分,並極力勸說其家人。在其影響下,加繆一路從小學讀到中學又到大學,並於 1936 年在阿爾及爾大學獲得哲學學士學位。加繆早期對基督教哲學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且吸收了尼采、叔本華等人的悲觀主義和無神論思想,這些在其後來的文學創作中都有體現。這期間,加繆負責編輯《阿爾及爾共和報》(*Alger républicain*),遭封後,於 1940 年來到巴黎,擔任新的主編工作,同時期完成了小說《局外人》(*L'Étranger*, 1942)、《西西弗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 1942) 和劇本《卡裡古拉》(*Caligula*, 1944) 的創作。二戰和二戰之後,加繆與當時的妻子福爾(Francine Faure)幾次往返於阿爾及利亞和法國,並在這其間完成了小說《鼠疫》(*La Peste*, 1947) 和戲劇《誤解》(*Le Malentendu*, 1943) 和《反叛

者》(*L'Homme révolté*, 1951)等名作。1960年1月4日,加繆在森斯附近的維勒布林文小鎮因車禍離世,車禍現場還散落著他仍以自己在阿爾及利亞的童年為背景《第一人》(*Le premier Homme*, 1994)的手稿。加繆一生傾情創作,1957年的諾獎授予他是當時對他的最大肯定。加繆的主要作品還有散文《西西弗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 1942)、《墮落》(*La Chute*, 1956)以及短篇小說集《流放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 1956)等多部。獲得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在為加繆寫的悼詞中這樣說:「當生命之門對他關上時,他已經在這邊寫出了人生的印記,這是每個藝術家隨身攜帶的對死亡的先見之明和仇恨,也是希望做的事情:我在世界上走了一遭。」¹⁴。

加繆是典型的存在主義作家,其作品中主要表現現實世界的荒誕;他又是典型的殖民流散作家,其存在主義作品又表現出與薩特等法國本土作家的不同特徵。一方面,加繆與北非阿爾及利亞的傳統阿拉伯文化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在殖民群體中,加繆又以邊緣人的群體自處。加繆在創作過程中不斷突破傳統,用荒誕手法表現現實世界,《鼠疫》便是其對生活荒誕性的一次大膽探索。作品中的裡厄(Rieux)醫生身為邊緣人,漂泊在疫病成災的城市奧蘭之中,積極救治他人,卻不知自己的妻子已悄然離世。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阿爾及利亞與法國的生活經歷為加繆帶來了豐富的想像和靈感,使其從不同角度出發去看待社會問題並表達對荒誕的態度。《局外人》則以一句令人訝異的話開篇,將世界的荒誕本質與人的無能為力娓娓道來,其中滿含加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存在主義哲思。福克納將其精彩傳奇的一生進行了總結,說他「就是不願沿著一條僅僅通向死亡的道路走下去。」¹⁵

納丁·戈迪默是第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也是首位獲得諾獎的非洲女性作家,更是一位典型的殖民流散作家。1991年瑞典文學院授獎時稱讚她「以強烈而直接的筆觸,描寫周圍複雜的人際與社會關係,其史詩般壯麗的作品,對人類大有裨益」¹⁶。戈迪默於1923生於南非鄉間礦山小鎮斯普林斯(Springs),其創作素材和靈感便來源於那裡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及其帶來的種種惡果構成戈迪默作品的重要主題。雖然出身於一個富裕的猶太白人家庭,但戈迪默一直致力於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並於1962年為南非國父、反種族隔離鬥士納爾遜·羅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1918-2013)起草了著名的演講詞《為理想我願獻出生命》(*I Am Prepared to Die for an Ideal*)。

納丁·戈迪默的作品對「複雜的社會和人際關係」觀察入微,真實記錄了政治對個人生活的影響,以及一個南非白人婦女在種族隔離制度興衰期間的感受和想像。在《伯格的女兒》(*Burger's Daughter*, 1979)中,她著重表現了父輩革命者與羅莎(Rosa)等年輕一代革命人之間的複雜社會關係。在創作《無人伴隨我》(*None to Accompany Me*, 1994)時,戈迪默堅定地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支持黑人解放運動,反抗種族壓迫。這位殖民流散女作家在寫作中善於利用多方位的敘事視角來刻畫人物並揭示事件的發展脈絡,善於運用隱喻的手法折射現實世界。戈迪默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弊病有著深刻理解,她認為這種制度不僅給黑人帶來傷害,同時也為白人帶來了困境。《七月的人民》(*July's People*, 1981)、《六英尺土地》(*Six Feet of the Country*, 1956)等作品,透露了普通白人民眾在非洲進退兩難的境地。

J. M. 庫切曾分別於1983年、1999年憑藉作品《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1983)與《恥》(*Disgrace*, 1999)兩度獲得布克獎,且於2003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諾獎評審委員會指出,庫切「精準地刻畫了眾多虛偽面具下的人性本質」¹⁷。庫切於1940年出生於南非開普敦,是英國和荷蘭移民的後裔,成長於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逐漸成形並盛行的年代。在南非開普敦大學就讀期間,庫切就已經開始了寫作生涯。受成長環境,即種族隔離制度的影響,其創作與社會矛盾和衝突緊密相連。1974年發表了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Dusk Lands*, 1974)後,庫切開始創作《國之中心》(*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1976),並於1980年憑藉小說《等待野蠻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1980)進入國際文壇。直至2006年,庫切才成為澳洲公民並在阿德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Adelaide)學院任教。

庫切用獨到的文字功底展現了後殖民時代下南非殖民流散者的邊緣化處境。小說《恥》中的人物盧裡(Lurie)的經歷旨在說明南非人民心中的殖民創傷的不可治癒,以盧裡為代表的非洲殖民流散者在南非流散之感被展現的淋漓盡致。庫切身為生活在非洲的白人,以親身經歷積極討論流散問題,展現了深切的人文關懷。在自傳體作品《青春》(Youth, 2002)中,庫切以溫和的口吻講述了一個名叫約翰(John)的年輕人在尋找自我的道路上進行鬥爭的故事。庫切也善於將創作主題鎖定於個人倫理障礙之中,即文化衝突給人帶來的邊緣化處境。《夏日》(Summertime, 2009)也隱隱透露著白人在非洲無法紮根的無助和迷惘。由於種族血統和成長環境的特殊,J. M. 庫切在創作中還具備了雙重文化視野,「特殊的童年經歷和文化背景使他具備第三只眼睛來審視和剖析當代南非生活的優越和從容,從而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種特殊的品格。」¹⁸。《幽暗之地》便是這樣一部作品,以諷刺的筆調闡明早期非洲白人殖民者的傲慢姿態和殘忍的殖民手段。

在非洲生活、學習工作了 20 多年的桃莉絲·萊辛是第五位獲得諾獎的非洲作家¹⁹,授獎時已年近九十,「以懷疑主義、激情和想像力審視一個分裂的文明,登上了這方面女性體驗的史詩巔峰」²⁰。頒獎詞稱其作品《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 1962)為「一部先鋒作品,是二十世紀審視男女關係的巔峰之作」²¹。萊辛的父母親都是英國人,但其童年時期和青少年時期均是在非洲度過的,是典型的殖民流散作家。萊辛出生在伊朗克曼沙(Kermanshah),1925 年隨作為殖民官員的父母移居到羅得西亞(Rhodesia)南部(即今辛巴威)。萊辛曾於辛巴威首都索爾茲伯里(Salisbury)的女子中學學習,13 歲時因眼疾輟學,結束了正規教育,後來依靠自學開始寫作。狄更斯、司湯達、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都是萊辛這期間的重要精神糧食。在非洲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後,1949 年萊辛才攜幼子移居英國。除了名作《金色筆記》,萊辛還創作了《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 1949)、《特別的貓》(Particularly Cats, 1967)和《倖存者回憶錄》(Memoirs of a Survivor, 1974)等一系列作品。

萊辛的作品充盈著非洲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情懷特別是女性體驗和種族衝突,很多作品都與非洲有關,《金色筆記》中的《黑色筆記》《非洲故事集》(African Stories, 1976)和《野草在歌唱》都盡情展示非洲元素。萊辛曾說:「我的腦海中充滿了關於非洲的燦爛記憶,只要我想,我就可以自由重溫和觀看」²²。萊辛筆下的非洲不僅是一塊陸地,更是一種意象;這樣的非洲也並不是種族衝突的舞臺,而是人類自我不斷嘗試適應的環境。在《野草在歌唱》中,萊辛描繪的非洲就是一個充滿矛盾、徹底失衡的空間。非洲大陸上的殖民主義一方面壓迫了黑人,另一方面也對白人造成了不可磨滅的精神創傷。這也是非洲的白人之所以成為流散一族的重要原因。萊辛在《蟻塚》(The Anthep, 1965)講述了白人男孩托米(Tommy)在一個黑煙滾滾、令人窒息的非洲偏遠礦場中成長的故事,展現了白人的邊緣處境和流散之感,用獨特的寫作風格和敘述視角揭露了殖民話語的實質,「這也是她的作品在白人統治時期的南非等地一直受到排斥,她本人多年來也被禁止進入當時的辛巴威和南非等國家」²³的主要原因。

殖民流散作家大多擁有西方文化視野,善於從外部觀察非洲人民的生存狀態,在作品中展現對非洲風土人情和社會制度的獨特考量。這些作家在創作呈現出一種多元融合的特徵,既帶有西方特徵,又有濃郁的本土意識和民族精神,表達了對於非洲歷史文化傳統的尊重及對非洲人民現實境遇的同情。無論是對白人殖民者及其後代在非洲被邊緣化的關注,還是對身份認同、精神出路等問題的探索,殖民流散作家都透過作品展現了對人性的質詢和身份困境的關懷。

三、古爾納:異邦流散中的諾獎得主

2021 年 10 月,坦尚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紮克·古爾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七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古爾納的小說創作堅持書寫移民經歷、難民記憶和殖民創傷,體現出典型的異邦流散症候。

古爾納的異邦流散記憶來自於他作為難民移居英國以後的種種經歷。1948年,古爾納出生於桑吉巴(現為坦尚尼亞)的一個島嶼,並在此長大。古爾納具有阿拉伯血統,以斯瓦希裡語(Kiswahili)為母語,家中伊斯蘭文化氛圍濃厚,父親和叔叔都是從葉門移民到非洲的商人。年幼的古爾納接觸並閱讀了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詩歌,從《古蘭經》《一千零一夜》等作品中獲得了最初的文學啟蒙。1964年,桑吉巴島發生革命,當地政府對國內的阿拉伯裔與南亞裔展開屠殺。身為阿拉伯裔的古爾納為了躲避迫害,於1968年以學生和難民身份來到英國求學,同時開啟他的創作生涯。最初,古爾納在坎特伯雷基督教會大學研讀,但因他對非洲、印度以及加勒比地區的難民生存現狀有著濃厚興趣,同時在1980年至1983年任了奈及利亞貝耶羅大學(Bayero University)講師與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英語系教授,並於1982年獲肯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這位殖民流散作家善於將自身的流散經歷融入創作中,並把視角置於身份認同、種族衝突、性別壓迫及歷史書寫之上,「展現後殖民時代‘夾心人’的生存現狀以及歐洲殖民對於桑吉巴社會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²⁴。

作為典型的異邦流散作家,古爾納在小說中通過對主人公命運的描述反映出了當時非洲的社會意識形態。通過童年期間的所見所聞,古爾納在作品中呈現了一個處於伊斯蘭文化浸淫下的桑吉巴。古爾納善於綜合運用各種藝術方式來刻畫人物性格,他在作品中創造了一系列人物,他們雖然力求適應新環境,直面衝突,但卻無法掙脫社會現實和過去的枷鎖,只能掙扎著保持平衡。古爾納在創作中透過一種冷靜的目光觀察生活,從不刻意去塑造一個完美的形象,而是通過細膩的筆觸,揭示人類生存的困境。

古爾納既是難民命運的見證者與承載者,也是難民記憶的擁有者和敘述者,在創作中更是緊緊圍繞難民主題展開創作。胡恩蘇(Hunsu Folasade)認為古爾納為21世紀非洲文學做出了兩個重要的貢獻,「首先,他表明移民應該被理解為定義非洲人身份的一個重要因素。其次,他將移民因素上升到有利於構建和理解家族和社區歷史的高度」²⁵。古爾納的小說《海邊》(*By the Sea*, 2001)揭示了難民薩利赫(Saleh)到達英國後,在內外衝突和兩種文化夾擊下的命運;《最後的禮物》(*The Last Gift*, 2011)中同樣敘述了移民主題,講述了移民經歷給移民及其後代造成的影響,利用細膩的筆觸揭露了種族主義下移民的身份認同危機,真實展示了移民遊蕩至異國後的苦難體驗;在代表作《天堂》(*Paradise*, 1994)中,古爾納則通過去中心化的視角,改用西方成長小說的形式來塑造非裔移民,探討非裔移民的邊緣化處境及其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天堂》曾入圍布克獎和惠特布萊德獎的提名,是古爾納創作走向成熟的標誌,它「再現了一個逝去的時代,既有浪漫色彩,但並不感傷過去,比非洲大陸的大多數歷史小說更加嚴酷」²⁶。古爾納筆下的移民、難民描寫與他本人的流散經歷密切相關。作為異邦流散作家的古爾納在創作的過程中不斷尋求本國文化與英國文化之間的融合,結合難民問題探索殖民主義對人類生存的影響。「古爾納將小說設置在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背景之下,結合關係空間,嘗試重新定義『非洲』,這種關係空間不再受排除異己的錯位政治和因民族主義及種族主義產生的暴力所束縛」²⁷。

同古爾納相似的是,索因卡於1954年20歲時到英國里茲大學求學,畢業後在那裡工作,1960年才回到奈及利亞,因此其作品也有較為明顯的流散症候。一定程度上說,索因卡也是異邦流散作家,或更準確地名之曰「異邦-本土流散作家」。留學期間的所見所聞為索因卡的創作帶來了深刻啟發,說明其利用外部視角來觀察和反思非洲文化。早在英國求學時,索因卡就開始鑽研文學創作,「他認為不僅要對非洲主題予以創作,也不能停留在非洲意象的簡單化用,那僅僅是機械化的模仿」²⁸。索因卡主張現代文學創作的目的是尋求對傳統美學的理解,而不是為了取悅外國觀眾而拋棄最本真的傳統藝術價值。小說《反常的季節》(*Seasons of Anomy*, 1973)以烏托邦理想的方式描繪了非洲部落埃耶羅(Aiyero),並吸取希臘神話的故事模式和神話原型來隱喻非洲的現實情況與人物形象。索因卡賦予這部作品中的迴圈模式以象徵意義,在西方現代派文藝思潮、希臘神話與非洲傳統文化之間建立聯繫。對當時非洲政府的腐敗進行了尖銳而有力的批



判,字裡行間流露出作者對西方無政府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批判。索因卡在英國的求學和工作經歷使他在回國後擁有了第三隻眼,能夠看到本土流散作家看不到的問題,從而使他的作品擁有了立體感。

「『流散』之所以成為『流散』,不僅僅是『地理位置的徙移』,也不僅僅是職業、身份、原因等方面的改變,它更重要的是異質文化上的衝突以及由此而來的對流散者靈肉方面的影響。」^②。不錯,異邦流散作家的流散症候即來源於此。邊緣化處境、身份找尋的迷失感成為這類作家作品的基調,而移民往往成為故事講述的主要角色,這樣就使得異質文化的交融與碰撞在其創作中得到直接凸顯。在非洲,這類異邦流散作家有很多,奈及利亞的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1977-),來自南非的艾捷凱爾·姆赫雷雷(Ezekiel Mphahlele, 1919-2008),以及衣索比亞裔加拿大作家奈加·梅茲萊基亞(Nega Mezlekia, 1958-)等都是代表性作家。異邦流散作家因長期漂泊異鄉,通常在創作中流露出對故土的眷戀之情。然而,這種眷戀之情受異國現實境況的束縛,在文學作品中多體現為審視非洲傳統文化與殖民文化之間的衝突,嘗試重新建立非洲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異邦流散作家以此為基調書寫非洲故事,與本土流散作家和殖民流散作家共同繪製著非洲文學的版圖。

結語

當下的世界文學「是西方人建構出來的以西方幾個大國為主、兼顧其他國家和地區某個文學側面的所謂『世界文學』」^③。非洲文學也是如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所看到的非洲文學同其他外國文學一樣,都是經過西方學者過濾後的非洲文學,相對缺少中國學者自己的判斷和篩選。這有歷史的原因,也有心理距離的原因,更有主體性的原因。非洲文學是一個不斷流動和不斷變化的文學體系,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靜態文本。古爾納獲在2021年10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其主要作品都沒有中譯本,只有譯林出版社的《非洲短篇小說選集》收錄了他的《博西》(Bossy, 1994)和《囚籠》(Cages, 1984)兩篇短篇小說。但獲獎後,古爾納旋即成為中國文化界、創作界和文學研究領域關注的焦點,上海譯文出版社更是雷厲風行,在短時間內簽下了古爾納全部長篇小說的翻譯版權,相關報導鋪天蓋地,相關評論也接踵而至。^④這一方面說明諾貝爾文學獎的巨大影響力,一方面也說明我們仍然缺少自我判斷和批評自覺。因此,中國學者研究非洲文學,還是應該從非洲本土視野和文化出發,挖掘名副其實的非洲文學,而不是拾人牙慧,唯人馬首是瞻,為他人作嫁衣裳。非洲文學以其寬宥的心態面對殖民歷史,並從中汲取自身發展的養分,展現出獨特性、包容性和前瞻性,這是值得關注和學習的。^⑤「流散症候」作為非洲文學的獨特表徵,對於正確認識世界各地的文學現象、創作發生和文化成因,揭示其複雜的源流嬗變和深層的世界文學文化意義,具有重要價值。七位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無一不是身處歷史洪流中,懷著去中心化、去殖民化和打破世界文學僵化和單一局面的動機進行文學創作,為非洲文學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貢獻,為文化多樣性和世界文學新格局的真正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注釋

① Swedish Academy, “Prize motivation”, Nobel Prize. org.,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21/gurnah/facts/>.

② Egoro, Ainehi. 103 African Writers Respond to Abdulrazak Gurnah’s Nobel Prize Win, Brittlepaper. (2021-10-12). [2022-02-02]. <https://brittlepaper.com/2021/10/103-african-writers-respond-to-abdulrazak-gurnahs-nobel-prize-win/>.

③ 「非主流」英語文學主要指除英國和美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的英語文學。關於「非主流」英語文學這一概念,請參見朱振武:《中國「非主流」英語文學研究的現狀與走勢》,《外國文學動態》2012年第6期,頁45-46。

④⑤ 朱振武:《揭示世界文學多樣性 構建中國非洲文學學——從坦尚尼亞作家古爾納獲諾貝爾文學獎說起》,《中國社會

科學報》，2021年10月22日第004版。

⑤⑪⑫⑲詳見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學的時代表徵及其世界意義——以非洲英語文學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頁135-158。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將非洲文學特別是非洲英語文學分為異邦流散(實現了地理位置徙移的尤其是到了發達國家留學、生活、工作的非洲作家)、本土流散(未曾徙移但處於異質文化的包圍而心靈在本土流浪的非洲本土作家)和殖民流散(特指在非洲安居下來的白人及其後代作家)三大類型,並從文學的發生、發展、表徵、影響和意義進行多維論述。在這「三大流散」理論的基礎上,作者還可發現一種常見於非洲歸國青年文學(Been-to)的異邦本土流散。

⑥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86. (2022). [2022-02-27].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

⑦ 元華,王向遠:《論渥萊·索因卡創作的文化構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5期,頁20-28。

⑧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88. (2022). [2022-02-27].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

⑨ 這是埃及國家級文學獎項。馬哈福茲在阿拉伯世界聲名遠播,50年代至60年代已在阿拉伯文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多次獲得埃及國家文學一等獎、共和國一級勳章和法(國)阿(拉伯)團結協會文學獎等,被譽為「阿拉伯小說之父」和「埃及的狄更斯」等。

⑩ 張洪儀(主編):《大愛無邊——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研究》,銀川: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頁5。

⑬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57. (2022). [2022-02-27].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

⑭⑮ 威廉·福克納(著)李文俊(譯):《福克納隨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頁155。

⑯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91. (2022). [2022-02-27].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

⑰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3. (2022). [2022-02-27].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

⑱ 朱振武,劉略昌(主編):《中國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研究導論》,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頁120。

⑲ 桃莉絲·萊辛是英國國籍作家,但其主要作品《金色筆記》、《野草在歌唱》、《蟻塚》等都以非洲為背景,存在大量非洲元素,都涉及作家本人在非洲的經歷,以及非洲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問題,因此本文將萊辛歸為非洲作家。

⑳㉑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7. (2022). [2022-02-27].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

㉒ Lessing, Doris. (2008). On not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PMLA*. 123(3), 780-787.

㉓ Carnie, Julie. (2008). Rhodesian children and the lessons of white supremacy: Doris Lessing's *The Antheap*.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43(2), 145-156.

㉔㉕ Hunsu, Folasade. (2014). Autobiography and 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f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bdulrazak Gurnah's art in *Desertion*. *Brno Studies in English*, 40(2), 77-89.

㉖ Bardolph, Jacqueline. (1997).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and admiring silence: Histories, stories and the figure of the Uncle. *Contemporary African Fiction*, 42, 77-89.

㉗ Steiner, Tina. (2010). Writing "wider world": The role of relation in Abdulrazak Gurnah's fiction.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 41(3), 124-135.

㉘ July, Robert. (1981). The artist's credo: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Wole Soyink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3), 477-498.

㉙ SHENG Hao. (2022). A corpus-based study on China's images in African English medi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21-33.

㉚ NI Hangying & LI Jun. (2022). A case of Mini-Study writing instruction for African EF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132-139.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